

都市社會學，台大社會創系的軌跡線*

蘇碩斌

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

都市社會學，是台大社會系 1960 年創系的起手式。六十年來，伴隨各種主題的躍起，都市研究看似淡出紅塵，實則不然。都市社會學，自始就是臺台大社會系置身台北市而無可避免受到撩撥的必然反應，然後再吸收不同時代的世界知識，而以在地感觸做出研究的軌跡線。

這一道軌跡線，大致分為：1960 年代「都市調查」時期、1970 年代的「都市化」時期、1987 年後的「政經批判」時期，再至 2000 年以後漸趨不定向的符號空間研究時期。

一、都市研究起點的 1960 年代： 傾全系之力的社會調查

1960 年創設台大社會系的第一批學者，是賡續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學，有極強的都市實證研究風格。領頭大哥，就是龍冠海。

龍冠海何許人？1906 年出生、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受業六年、1929 年赴美國史丹福和南大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，1935 年返回中國任教於南京的金陵女大（章英華 1991）。彼時中國社會學界充滿都市研究的氣場，有金陵女大吳景超出版《都市社會學》，上海復旦大學孫本文開課「都市社會學」，邱致中八大冊《都市社會學原理》的

台灣社會學第 40 期（2020 年 12 月），頁 215-226。DOI: 10.6676/TS.202012_(40).12

* 本文改寫自〈研究人或空間——臺灣都市社會研究的成立與變化〉（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20(3): 397-439, 2008）有關台大社會系的部分摘引，另再增補 2008 年之後的都市研究成果，感謝黃怡菁同學協助蒐集資料。

訴求也是都市社區調查（楊雅彬 1992；王康 2008）。即使 1937 年金陵女大因戰火遷校成都，擔任社會系主任龍冠海也仍堅持開授「都市社會學」（龍冠海 1972: 序），幾年間並帶學生完成多項調查，如〈成都慈善機關調查〉、〈成都保育院難童調查〉、〈成都市市立第一遊民教養所流浪兒童之研究〉……。調查報告輯印為《社會調查集刊》上下集（張連紅 2005），是戰前中國都市社會學的典型成果。

龍冠海 1949 年渡台來到台大，都市調查也跟著來。沈潛良久，1958 年龍冠海約了楊懋春、郝繼隆（Albert O'Hara）、陳紹馨向校長錢思亮要求開辦社會系（龍冠海 1963: 138）。1960 年在美國亞洲基金會顧問艾伯華（W. Eberhard）助攻下，社會系、農業推廣系同時成立——因為兩者都是因應當時人口離鄉向都的大問題。兩系不只師資交流，當年龍冠海和楊懋春也談了研究的分工——農推系研究鄉村，社會系當然是都市（葉啟政 1988: 210-211）。

都市既是台大社會系的守備範圍，創系不久的 1963 年，龍冠海就率全系師生（郝繼隆、陳紹馨、范珍輝、張曉春等）開展「臺北市社會基圖」調查。龍冠海並刻意與農村研究劃分界限：「我們特別著重都市社會的實地考察，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們的校址是在都市裡，……另一種理由是我國的農村研究已有做了許多，而都市的社會學探究卻尚屬少見。」（轉引自章英華 1991: 46）

《臺北市社會基圖》畫出四十八幅地圖，伴隨多篇報告，1965 年起發表成果，著名的有張曉春〈臺北市延平區區位結構之分析〉、朱岑樓〈臺北市古亭區人民團體調查報告〉、范珍輝〈臺北市古亭區居民健康狀況與醫療組織〉、陳紹馨及李增祿〈臺北市古亭區家庭調查報告〉，並在 1967 年由龍冠海寫了一篇「總提要」後結集出版（龍冠海編 1965）。之後至 1970 年間，成員的研究成果陸續再發，如張曉春〈臺北縣永和鎮都市化之研究〉、朱岑樓〈臺灣工業發展與人口成長〉、龍冠海〈近二十年來臺灣五大城市人口結構的研究〉。

這個第一階段的台大社會系，全員都是都市調查代表隊。但《臺北市社會基圖》成果只停在「調查」，章英華（1991: 31）評述他們

「提出值得注意的問題，而非對既有的社會學理論的檢討或修正」，亦即，還未展露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內含。

台大的都市社會學隊伍，1974 年後增加林瑞穗、1990 年起增加中研院合聘的章英華、伊慶春、傅仰止等留美歸國學者，都市社會學於是推向更加「芝加哥學派」的第二階段。

二、都市研究盛世 1970-80 年代： 都市化典範

1971 至 1986 年台大社會系的研究方向走穩，也展開更大壯志，開始理論化的工作，也就是「都市化典範」最茁壯的盛世。

首先，龍冠海仿效芝加哥學派創始人 Robert Park，提出「人文區位論」（human ecology，或譯人類生態學）。龍冠海在 1972 年寫的《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》，主張人類在空間上如植物「集中、集中化、隔離、侵入、承繼」，理論應用的研究呈現在兩部著作：1970 年〈臺灣五大城市的人口分佈狀態〉及〈臺北市郊區四市鎮之人口結構與變遷之研究〉。這位龍大哥的區位研究一出，同年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》跟著刊載郝繼隆〈歐洲、亞洲及臺灣都市化的比較一文〉、麥留芳〈歐洲、亞洲及臺灣都市化的比較〉及〈社區研究中之人口途徑〉，熱烈介紹芝加哥學派 Philip Hauser 及人口生態學家 O.D. Duncan 的統計技術。不久，朱岑樓 1972 年受邀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登出標題誇張的〈區位學：目前美國最時髦的一門科學〉，年底再出版《人區位學名詞解釋》。「人文區位學」，是台灣社會走紅的學術明星。

第二，「人口統計」方法結合「區位研究」理論大爆發。1974 年林瑞穗發表〈臺灣各縣市與臺北市間人口徙的探討〉，率先在台灣以人口資料結合區位觀點，成為支配台灣社會學界十五年的主流，到 1987 年，產出至少二十餘篇重要論文。除了台大幫，也帶出東海

（席汝楫、江玉龍等）和政大（謝高橋、熊瑞梅等）兩派，席捲台灣社會學界。這些論文的主要關鍵字，是都市內部區位、跨都市遷徙，而且幾乎都以戶政統計、實證調查為方法，以台北及衛星都市為對象。1995 年章英華《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》，採用因素生態分析法為台灣四大都市的區位解謎，是這一期最高峰。

持續蔓延的，有社區研究、鄰里關係、都市心理學等。開始社區研究是中研院民族所文崇一、瞿海源，1973 年以研究萬華的《臺灣北部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與調適》計畫開始，後有 1977 年「岩村的工業化與社區生活」計畫。

這種傳統社區的「現代化」，原本迥異於當時主流的「人口／區位」路線，但 1978 年文崇一寫出〈社會變遷中的權力人物〉指出專權黨派型權力結構的社區，人口有以下特色：高都市化、異質文化、職業分化。幾個「變項」竟吻合芝加哥學派 Louis Wirth 都市性格（urbanism）的著名論點。文崇一是台大合聘，社區研究因此進入社會系開枝。同年林瑞穗〈都市社區鄰里關係、社區團結與社區發展之研究〉一文繼續檢證 Louis Wirth「都市生活導致人際關係表面化」論點，誘發台大社會系 1980 年代的社區意識、鄰里關係的研究大潮：文崇一的社區生活規範、傅仰止的社區消逝及都市原住民、伊慶春的鄰里關係。

「都市社會心理學」也頗有成果。中研院與台大合聘的傅仰止在 1983 年就引介 Georg Simmel 及 Louis Wirth 的理論，1990 年代再以調查統計解釋心理的自變項（如市民容忍度、公私領域、非慣俗性格、夜生活），論證了台灣都市人有異於鄉下人的心理特質。

台大社會系這波「都市化」典範的關鍵字是「社區」。很巧的，正與台灣的「社區政策」節奏呼應——都市化典範起點 1974 年，台北市推出「社區發展計畫」；都市化典範衰微的 1994 年，代表另一時代的「社區總體營造」由文建會提出。二十年間兩個「社區」的政策內涵極為迥異——1994 年後的「社區」已不再有興趣於區位分布

或都市心理，而是關注資源分配、住民權力、地方認同，以及行動實踐。

三、都市典範盛世鬆動後的 1990 年代： 政經批判的崛起

「都市化」典範當了十餘年主流，在 1987 年前後地位動搖，受到新都市社會學（New Urban Sociology）挑戰。林瑞穗 1984 年〈都市社會學的理論探究途徑〉一文很早為台灣引入新都市社會學，並說明 1960 年代美國學者無法解釋都市新的衰敗危機、因而引進歐陸「都市政治經濟學」，最後點名介紹 Manuel Castells 及 David Harvey 兩個後來在台灣의 明星。可是林瑞穗結論說，「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仍然存在，新都市社會學僅是一股後起的小勢力。」（林瑞穗 1984：378）

林文刊出三年後，台灣解嚴。壓抑幾十年的都市問題一夕迸發，熱錢湧入、房價狂漲、無殼蝸牛上街……。這些現象，台大社會系原本擅長的人文生態、社區發展論點，幾乎都無能解釋。林瑞穗稱為「後起的小勢力」的新都市社會學，此時由台大城鄉所（及前身台大土木系都計組）大力呼進並捲動風潮，台大社會系沈浸都市社會學二十餘年的濃度，一下就被稀釋掉了。

新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密集湧現，1987 年夏鑄九在《當代》雜誌狠批忠孝東路四段地價陰謀的〈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〉，1988 年新創刊的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》規畫「台灣都市問題」，打出七篇政經批判團體戰，作者群張景森、孫義崇、米復國、許坤榮、陳志梧，悉數為台大城鄉所系統的研究生。其中，張景森〈戰後臺灣都市研究的主流範型〉尤其辛辣，引用 Manuel Castells 的左派論調批評台灣一般的都市社會學（如龍冠海、蔡勇美）是將「都市地區處理成與他們所

在社會無關的自主的實體性都市研究」（張景森 1988: 24）。

社會學界的內部反省跟著來。1990 年《中國民族學通訊》（後更名《臺大人類學刊》）製作「空間概念」專題，邀請四名學者回顧人類、地理、社會、考古四學門受到「空間」議題的衝擊。社會學由章英華回應，反省了人文生態學、政治經濟學兩種觀點的不足，指出人文生態學將都市當作自然環境，「只是被設定為常項而已」，但新都市社會學已放棄「結構是因空間是果」的老舊邏輯，所以，研究都市空間，也無法避談國家和資本主義的不當介入力量。

章英華的反省，影響其指導的蔡采秀以政經力探討地方都市史。歷史方法在台灣的都市社會學長期缺席，1986 年章英華〈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之變遷〉一文稍有突破，蔡采秀 1995 年引用世界體系的鉅型理論在博士論文《板橋的都市發展（1895-1985）》，以市場帶動和國家干預為原因，解釋板橋從日治的地方都市格局、戰後一躍為全球資本的結點。蔡采秀這本土產的博士論文，一在歷史的方法有突破，二在政經批判的主題有突破，是臺大社會系「都市化」典範從內部鬆動的卦象。

另一重要內部變因，是 1990 年聘進陳東升——至今三十年系內唯一增補的都市研究專長者。這時龍冠海世代在 1980 年代前夕已退休殆盡，至於社區研究世代，除了專任的林瑞穗和合聘的章英華仍在都市領域的教學研究，其他教師實已淡出。之後 2001 年林瑞穗退休、中研院章英華不再合聘，都市社會學在台大社會系從主流快速變成少數。

陳東升開出很不同於先前的都市政經批判研究，亦即廣義的新都市社會學，專注土地創造巨量財富的政經批判。同路數的代表文章，有陳東升（1992）“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Growth: A Cross-National Study”、陳東升與周素卿（1993）〈國家結構、政商關係與空間形構〉。人口生態學者也轉進都市的發展不均衡議題，如陳東升、章英華、張荳雲（1993）“Consumption Relationships and Urban Hierarchy: a Case of Medical Care Service”。

1995 年陳東升《金權城市》堪稱都市政經批判代表作。此書分析台北周邊城鎮「水返、祖田」的房地產炒作，開場就說「回到傳統都市社會學的文獻中我們幾乎找不到解釋這些問題的論點」（陳東升 1995: 4），第一章也表達研究立場是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，認為主導都市空間形式發展的機制是資本主義的邏輯」（陳東升 1995: 15）。

批判資本主義與國家合成為「成長機器」的立場，後續延伸出「抵抗國家」的市民權研究，就不意外了。解嚴後十年的都市研究，就是結合都市抗爭、都市治理而生出濃厚的社會運動氣味。蕭新煌（1997）就特別點名〈都市居民運動〉在台灣社運史佔有的重要位置。

台大社會系的都市研究，1990 年代轉向政治經濟批判之後，火力不弱、品質也札實，但投注都市專業研究的人數已相對銳減；相對於外頭的城鄉、地理學者活躍在都市運動、社區營造之時代，「台大社會系」在都市領域已不再具有品牌辨識度了。

四、左派典範發散的 2000 年後 ——符號的空間改造

但不要以為 2000 年後台大社會系的都市研究真的凋零。其實，還有一道水脈在伏流。

陳東升 1995 年〈臺灣都市社會學的理論、經驗研究與方法〉一文，除了指出政經研究浮現，也關心到「後現代的都市研究很少」，而且提醒這些研究的「論點與後現代理論將都市看成是過度擬象實體的立場大不相同」（陳東升 1995: 377）。陳東升所評的過度擬象實體，應就是 Jean Baudrillard 的 hyperreality 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概念。1995 年彼時，台灣的都市消費研究的確尚未萌芽，但之後十年，空間消費研究實已發展出某種力量。

1990 年代起引領台灣都市研究的「空間轉向」，脈絡源自法國

左派思想家 Henri Lefebvre 在 1974 年以符號學開展的空間生產理論。Henri Lefebvre 的都市，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思考的都市——作為工廠聚集地、「在空間上生產」（production on the space）的都市；Lefebvre 的都市，是利用自身空間的符號就可創造驚人財富、「空間自身即可生產」（production of space）的都市。換句話說，以符號來分配空間功能（都市計畫）、以符號來調度生活風格（消費策略），都是比工廠生產更重要、更迅速、更龐大的都市財富製造器（Lefebvre 1991[1974]）。

Lefebvre（1996）理論分出二個分枝。其一，即前節的美國新都市社會學，如 Manuel Castells、David Harvey，關注空間財富創造的不公義、不平等；其二，則是 Jean Baudrillard 等「後現代理論」，以符號學方法揭露工業生產是仰賴「符號消費」的陰謀才得以支撐。Baudrillard 的著名論證「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」，就痛批馬克思試圖回復「使用價值」的不可能——因為，符號（就像是語言）早已是人類賴以為生的邏輯，符號經常是國家與資本主義用來支配使用者的利器（Lefebvre 稱之空間的再現），那麼反過來，符號也能被「使用者」用來反擊固有空間的定義（Lefebvre 稱之再現的空間）——也就是 Lefebvre 主張符號可改變地景、可奪回「都市的權利」（the right to city）之心聲。

2000 年後的台大都市研究，看似數量不多、主題零散，但內涵其實有一道受到 Lefebvre 前述第二分枝影響、企圖以符號改造都市的水脈。

2002 年蘇碩斌博士論文《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》（後改寫為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），即引 Lefebvre 解釋了台北在清代傳統政權「看不見的地方社會」，在日本殖民政府「現代」科學調查下成為政府「看得一清二楚的空間社會」，所以台灣每一吋土地都由都市計畫掌握、規畫（蘇碩斌 2002；2005）。但這本論文只批判了國家以符號支配人民，卻缺乏討論使用者以符號反撲的能動性。

使用者的能動性，是下一波台大社會系討論都市的關鍵。台灣不

只 1990 年有房價狂飆，2000 年後各種原因（外國人炒房合法化、貸款利率暴低等等）也讓地價一直不回頭。符號學式的空間生產理論，真的很契合 2000 年後台灣的現實。在這種社會情境下的台大社會系，都市研究雖不再成群結隊，但陸續零星都在追索空間符號化的問題：一方面批判官方及資本主義塑造了新消費空間，另一方面則以各種案例找出「使用者」一點一滴討回空間定義的可能性。

藍佩嘉 2008 年《跨國灰姑娘》（2006 年 *Global Cinderellas* 改譯），以札實田野挖掘 58 名菲律賓女性家務移工的台北生活，不僅討論全球都市移動、家務分工、情感勞動，更不可忽略他們竟改變了都市空間定義：暱稱「中山」的聖多福教堂一帶，地景或許未變；但已被挪用為全新的空間定義。

台大社會系持續有都市空間的消費研究，李明璁（2009）〈去／再領域化的西門町：「擬東京」消費地景的想像與建構〉，指出西門町地景原本富含「日本殖民」符號，但 1990 年代消費行動急速改換為全新的「哈日」符號。蘇碩斌（2016）撰寫的〈Mega Events 進化史：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〉，揭發「都市更新」如何挾巨型活動消費之名而完成的陰謀，或許算是《金權城市》的符號消費版本。

社會系 2010 年後的幾篇學位論文，以符號消費觀切入空間研究者不少。兩本略醒目如林穎孟（2011）《我在「女僕喫茶」工作》、謝碩元（2014）《暗夜裡的白日夢》，都親身直搗女僕店和公關店，是一手田野調查的成果、也是社會負面標籤的反思。吳佳盈（2010）《重返西門町》、陳含葦（2015）《多義的中正紀念堂？》也找到青少年、男同志、年輕學生對既有空間重新賦予符號的事證。

改變空間的文化革命，就是一條不明顯但伏流的脈絡，最近五年其實更具體、更值得注意。陳東升將《金權城市》的政經批判落實投入改革，開設實作課程、帶動學生行動，有幾篇研究論文可窺理念，如：葉欣怡和陳東升（2016）〈參與式預算在社區〉、林祐聖和陳東升（2018）〈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〉，及周睦怡、熊慧嵐和陳

東升（2018）〈在地社會創新網絡：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在地實作為例〉。這些實作，都有堅實的理論討論，意欲突破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的封閉性和權力中心化問題，明確的進展，是攪動大學行動者參與在地實作，形塑出「新的社區營造理論」。

不論是改變都市空間定義、或重塑住民社區，也不論是政經批判、或是符號消費，從以上趨勢，都可看到相近水脈的伏流。

五、結論

六十年的台大社會系，即使一直置身台北市區，但從前是與總區隔絕的法學院，現在是距離公館頗遠的後門區，總是中心和邊陲的尷尬中間。

活在都市，必然跟著都市呼吸和思考，久而久之習以為常，就忘了都市的存在。台大社會系的都市研究，似乎也是這個道理。最初，前輩們以為站在道德的中心、以啟蒙者和醫治者的立場望著邊緣人；而今，我們比較看懂都市是多元人群的共生，沒有必然誰在中心，更不需自己跳出來揹負摘奸發伏或照亮幽暗的使命。

台大的都市社會學，早已從權力的側邊改站到權力的對面，當年那樣的典範不再，其實也不算壞。所以，無須以為都市社會學已褪去玫瑰色容顏，因為，都市議題其實以無所不在的換喻方式，藏在所有社會學裡面。

參考文獻

文崇一，1978，〈社會變遷中的權力人物：社區領導人與權力結構比較分析〉。

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46: 1-30。

王康，2008，〈中國社會學史〉，參見《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》（<http://lib2.tngs.tn.edu.tw/cpedia/Content.asp?ID=18190&Query=1>，取用日期：2020 年 10 月 30 日）。

- 吳佳盈，2010，《重返西門町—青少年與男同志再現空間的政治經濟分析（1994-2010）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李明璁，2009，〈去／再領域化的西門町：「擬東京」消費地景的想像與建構〉。《文化研究》9: 119-163。
- 周睦怡、熊慧嵐、陳東升，2018，〈在地社會創新網絡：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在地實作為例〉。《台灣政治學刊》22(2): 147-202。
- 林祐聖、陳東升（2018）〈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：兩個社區的比較研究〉。《台灣社會學》35: 109-149。
- 林瑞穗，1974a，〈臺灣各縣市與臺北市間人口遷徙的探究〉。《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》10: 121-129。
- ，1974b，〈都市社區鄰里關係、社區團結與社區發展之研究〉。《社區發展季刊》5: 44-68。
- ，1984，〈都市社會學的理論探究途徑〉。《思與言》22(4): 45-60。
- 林穎孟，2011，《我在「女僕喫茶」工作：跨／次文化中的女性身體與表演勞動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張連紅編，2005，《金陵女子大學校史》。江蘇：人民出版社。
- 張景森，1988，〈戰後台灣都市研究的主流範型：一個初步的回顧〉。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1(2-3): 9-31。
- 章英華，1986，〈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之變遷〉。頁 233-273，收錄於瞿海源、章英華編，《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（上）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- ，1991，〈龍冠海教授的生平與學術：東西文化洗禮下中國社會學家一個例子〉。《中國社會學刊》15: 41-55。
- ，1995，《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》。台北：巨流。
- 陳含葦，2015，《多義的中正紀念堂？紀念空間的意義轉變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陳東升，1992，“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Growth: A Cross-National Study.”《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》21: 35-92。
- ，1995a，《金權城市：地方派系、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》。台北：巨流。
- ，1995b，〈台灣都市社會學的理論、經驗研究與方法〉。頁 365-97，收錄於《金權城市：地方派系、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》。台北：巨流。
- 陳東升、周素卿，1993，〈國家結構、政商關係與空間形構〉。《國立台灣大學

- 社會學刊》22: 149-183。
- 陳東升、章英華、張苙雲，1993，“Consumption Relationships and Urban Hierarchy: A Case of Medical Care.”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（工業社會發展問題研討會特輯）》26: 107-118。
- 楊雅彬，1992〈社會學在中國的成長時期（1927 年 -1937 年）〉。頁 275-301，收錄於王康編，《社會學史》。北京：人民出版社。
- 葉欣怡、陳東升、林國明、林祐聖，2016，〈參與式預算在社區—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〉。《國土及公共治理》4(4): 29-40。
- 葉啟政，1988，〈對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社會學發展的反省〉。頁 193-235，收錄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編，《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》。台北：聯經。
- 蔡采秀，1995，《板橋的都市發展（1895-1985）：兼論其社會影響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
- 蕭新煌，1997，〈都市居民運動〉。頁 391-441，收錄於蔡勇美、章英華編，《台灣的都市社會》。台北：巨流。
- 龍冠海，1963，〈國立台灣大學設置社會學系的來龍去脈〉。《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》1: 135-139。
- 編，1965，《臺北市社會基圖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。
- ，1972，《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》。台北：三民書局。
- 謝碩元，2014，《暗夜裡的白日夢：酒店男公關與我們的異視界》。台北：時報。
- 藍佩嘉，2008，《跨國灰姑娘：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》。台北：行人文化實驗室。
- 蘇碩斌，2002，《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：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
- ，2005，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。台北：左岸文化。
- ，2016，〈Mega Events 進化史：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〉。巷仔口社會學，<https://twstreetcorner.org/2016/06/14/sushuobin-2/>。
- Lefebvre, Henri. 1991[1974]. *The Production of Space*. Cambridge : Blackwell.
- . 1996. *Writings on Cities*, trans.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. Cambridge : Blackwell.